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 工作简报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编印

---

## 目 录

### • 学术活动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六期纪要……………1

附：研习会发言记录稿

    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 陈少明 ……………20

### • 简讯 •

署名“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 ……………39

本期责任编辑 王兴赛 叶甲斌

• 学术活动 •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六期纪要

**时间：**2013 年 12 月 26 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马哲所会议室

**主题：**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

**主讲人：**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

**主持人：**徐长福（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其他与会人员（按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列）：**陈长安、邓伟生、郝亿春、林育川、龙霞、马天俊、马永康、谭群玉、王硕、朱一文等老师和约 30 名学生。

**录音整理：**叶甲斌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六期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在中山大学锡昌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会议室举行。本期研习会主题为“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讲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和谭群玉副教授分别是本次研习会的主持人和点评人。

在报告中，陈少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与我们紧密相联，同时也是观察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问题”不是如农民需要解决土地所有权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存在本身才是“问题”。但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也非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应该被消灭，而是需要改变其固有形态的问题。他指出，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可以概括为：中国革命（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自动合乎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后才能满足这种需要。陈老师进一步梳理了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政策，并展开论述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与社会秩序的紧张状态。最后，他认为随着现代化产生的“知识分子问题”被现代化的发展所消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不是因为政治改造而被消灭，而是被历史埋葬。

徐长福教授在陈老师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了相关的点评。他首先对陈老师此次报告表达了一些感想。他说他一开始接到陈老师的文本是在刚到英国的时候，看完之后非常受启发，特别是报告的主旨。像知识分子问题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它，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它不是被解决了，而是消失了。他认为陈老师的研究里包含着非常了不起的洞见，于是就邀请陈老师到实践哲学研习会来做一次报告。随后，徐老师还简要介绍了实践哲学研习会。他认为现在中国大陆哲学学科的八个二级学科的划分是刚性的，因为涉及到体制、师资安排和学术传统等各个方面。但是随着哲学的发展，像知识分子的问题一样，学科划分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慢慢地消失。因为我们建立起了一些横向的联系。如果学科的划分是比较刚性的经线的话，我们建立横向的纬线把二级学科串起来，像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以及下属的各种活动，包括“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实际上就是想起这样一个作用，即在我们刚性划分的二级学科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不管你在体制上属于哪个学科，我们出于兴趣一起探讨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徐老师以今天的报告为例，他说，陈老师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的“经典与解释”，可是今天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关注的话题，这也表明了我们的平台这样一种纬线的编织是非常有必要的！接下来，徐老师请马哲专业的谭群玉老师来给陈少明老师的报告做点评。他说，因为谭老师是历史学博士，是桑兵老师的高足，现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刚好是做这一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一个背景、传统和视角，陈老师是中国哲学的背景、传统和视角，所以请谭老师来做点评正好能达成学科交流的目的。

谭群玉觉得给陈老师的报告做点评的工作很不容易。她指出，评论的难处主要在于陈老师的视角和人家不一样，如果他是在意识形态框架里面来说的话，那就可以找一下反面来和他讨论，如果他是反对的话，就可以从正面和他商榷，可是他偏偏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在整个过程中来讨论。她想让陈老师展开一些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能展开的问题，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信息。首先，在谭老师看来，陈老师用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说以纯粹学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然而如果从官方的意识形态逻辑来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看到的跟陈老师有可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毕竟是政府来对待知识分子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另外，谭老师觉得，陈老师对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很乐观了，因为陈老师说 1989 年可能是最后一次知识分子的问题了，那么怎么看待未来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不是这种乐观能持续保持下去？谭老师进一步指出，关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其实不光是知识分子跟政府的关系有问题要处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不断有反对“经验主义”，这个“经验主义”主要是针对只有经验而没有知识的工农干部，所以他们也是成为要改造、要对待的对象。还有反对“教条主义”，虽然“教条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理论太多而没有实践经验，这也是要对待的一个问题。还有反对“宗派主义”。像整风运动，它主要整的是共产党，也不专门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像这种也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知识分子的问题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上的差别？

谭老师认为陈老师的报告对于“文革”的介绍很有启发性。因为以前我们对于“文革”都是以“政治大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那么一种斗争，但是她说自己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它叫“文化大革命”。她说前段时间看资料，看到当过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曾经讲，“文革”主要是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人在那里做，其他都没有动，工厂不动，农村不动，主要是学生在串连，其他人一定要坚守岗位。她就很疑惑为什么把学生动员起来做这些东西。今天看了陈老师文章，她基本上解除这个疑惑了。因为陈老师说“文革”实际上是要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它革的是知识分子的命。

陈少明老师对谭老师的点评表示感谢。他认为谭老师的这三个问题都是大问题！他指出，第一个问题隐含在评论中，第二个问题不时有人会问他，第三个问题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因为很少有人会考虑到共产党内的“反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跟这个问题的关联。而这的确是有关联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想，只能是直观多少回答多少。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大部分在我们的文件里面会表达出来，就是他一开始所说的，知识分子自己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这些人本身的阶级的属性导致了他们不能完全被这种需要所完全接受，最后要改造成合乎需要的，这个大概是意识形态立场中的一般表述。可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是需要的，什么样情况下是不需要的，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笼统来说，我们可以说它自始至终都是这么认为的！

陈老师认为，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哪一部分属于不需要的，它们在不同时期就会有变化，比如说在 1958 年的时候，他们要专门针对跟共产党争夺天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到了“文革”的时候他们要讲的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它不断地变换着内容。但是不变的是，工科出身的、应用型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拿出来怎么样。如果我们从知识来讲，首先文科的知识最主要，其次呢，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理科的，再其次就是工科、应用型的知识。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但为什么是这样？按道理来说，如果按传统的阶级立场的划分标准，那应该表达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跟资本家有多少财产、地主有多少田地这样来划分阶级属性。可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些知识，都给它们带上阶级属性，这就表明，这个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完全是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用的一个概念，这不是这样一个事情，要不到的话，早就改造完了！地主和资本家把他们的东西弄掉，然后他们就没做什么事情，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直有问题？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前面老的知识分子有问题不说，后来新的知识分子也有问题，所以文革的时候对于教育有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 17 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没法理解了！唯一的可能就是，知识本身能够赋予阶级属性，而且赋予的这个阶级属性并不是知识本身具有的，而是知识在应用和表象社会功能时与现有政治理想有冲突，这时才产生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知识分子问题是否真的消失了，陈老师认为在这里要界定一个问题，他讲的“知识分子问题”消失了，是打引号的那个“问题”消失了！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今天界定的话，我们一定不能说有知识的人做什么事情就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这个是要区别的。所以说，即使我们现在的学生找不到工作，然后不满，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知识分子问题，已经不能了！现在政府不把它们看成知识分子问题，学生自己也不把这看成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只能说，有知识的人中还会有一些相关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定义，我们可以讨论。陈老师说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绝对不乐观，但是不会把它理解为，他们需要通过改造、通过做什么东西来解决。政府不会干这么傻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政府来说，这个成本高并且是没有用的。陈老师指出，无论如何这个社会总是有一部分人会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他比较倾向于把知识分子的定义收窄一点，就是把从事知识创

造和知识传承职业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的人是不是要收集进来？因为只要有知识，我们都应用，我们没有标准可说。从事知识传播的人，比如媒体人在多大的意义上是知识分子，陈老师对此比较疑惑。但教师和专门学术研究的人是知识分子，他觉得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法说了。

另外，让陈老师觉得有点疑惑的是，报纸上时不时地说起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哪一个内容，他们表达的内容是一个社会阶层，还是人选择的某一种职业。因为社会阶层和选择职业不一样，选择职业表明，他不选择这个职业他就不干这个事情了，社会阶层则是身不由己就在那里面的。就像农民工进到城里面，他是不想但是他没法摆脱！可是像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很多是有选择的，他不干的时候是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不太好确定。但是如果不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那人太少了。陈老师认为，如此一来我们会面临两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的定义收得很窄，结果就会是，这个社会没什么知识分子，如果把它放得太宽，那结果就会成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陈老师觉得这个事情他的确没有想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只不过他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定义，都可以跟他说的那个问题分开！

陈少明老师肯定了第三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内时不时有“反经验主义”和“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很多文件里面也会同时说这两个方面，一直到文革的批示都有说“反经验主义”。他认为，毛泽东的“反经验主义”的确是反对那些不从理论出发的人，而不是反对知识分子，而“反教条主义”是反知识分子的，比如像反王明等。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确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可是从毛泽东自己最直接无误的表达看，毛泽东主要是经常“反教条主义”的，比如毛泽东说“工业很容易做”等等。此外，陈少明老师觉得，共产党内的“反经验主义”的倾向会使它内部知识阶层的知识累积得越来越高，使得“反经验主义”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他认为，现在共产党很少讲这种内容了，不论他们会在哪种知识和哪种立场上对立，而不太会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当时队伍里面拥有权力的人和不拥有权力的人的知识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尖锐地表现出来。据他的观察，这两个概念应该从江泽民以后就没有怎么听说过了，至少在主要的文件中。陈老师肯定这两个问题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表

示对这个问题他确实没有研究。他倒觉得谭老师应该研究一下。

徐长福老师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按照陈老师的看法，至少我们在座的师生应该都是知识分子。他说他要先给陈老师的一个判断做一个注脚，然后开放给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徐老师说，陈老师刚才讲，越落后的地区对知识分子整得越厉害，对此，徐老师深有体会！因为徐老师大学毕业是到藏族地区工作，所以被整得比较厉害，而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同学倒没什么事。比如那里处级以上干部好多都没有文凭，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就很好了，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们在用人的时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只用中专生不要用大学生，而他那时候不幸是大学毕业的，所以都是受歧视的！因为中专生比那些领导的知识要多一点，可以帮领导起草文件、写讲话等，能够弥补领导的不足，同时又比较听话比较好驾驭，而大学生就不一样。所以领导身边的秘书都是从小学调过去的，小学的老师那时候一般是中学毕业生。

接着，林育川老师向陈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即根据陈老师的判断，知识分子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它是被现代化的发展消解掉了，即因为知识分子的要求在社会上得到了满足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能不能把这样一个过程同样理解为，这一帮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被“招安”了，或者说现在成了吃皇粮的人，而对于那些没成为吃皇粮的人，问题仍然存在？如果现在经济出现问题，大学的教员失业，这个问题又重新呈现出来，能否这样理解？

郝亿春老师认为，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政见或者价值观不大一样，如果都听他的，都按他的去做，是不是没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问题是不是在一小搓里面。理工科相对较少，文科主要分两类，一个是人文，一个是社科。人文这一类可能是最多的，特别是哲学！这样的话，是不是说，知识分子作为问题在整体上是不是比较突出的？一旦有价值观上的分歧，他们就会成为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歧，他们的问题就会小一些？另外，郝老师问到，现在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士在古代的政权中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从传统的士到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

徐老师说，亿春是不是想说，知识分子问题是在古代就有，还是在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体制下才有。

孙清海老师指出，根据陈老师的观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问题是消失了，但

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力还是存在的。他认为青年教师感觉可能比较明显一点，比如说有一天督导突然进入课堂，老师心里就会不踏实。如果老师的言论过于激烈，有的学生或者从事无间道工作的人就会举报老师。如果老师出格了，触及了政府的底线，那么这批教师就会被开除，比如最近北大就开除了一批教师。这说明政治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还存在。

徐老师说，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诠释为，“消失”是表面上消失了，实际上还没有！

陈少明老师首先回答了林育川老师的问题。陈老师认为，在一些现象里面，拥有知识的人在社会的价值上得到满足以后，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他总体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途径使得知识的应用机会比以前提高，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还想要读大学，至少大家都期待这个样子。如果在哪个时期有经济危机，或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人失业了或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能被理解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西方也有失业，大家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这跟经济的周期性相关联，而人家没有把它叫做“知识分子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叫做“知识分子问题”？他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是特有的！它要把你的知识获得的东西赋予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是人家把你叫做知识分子，你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假如社会中大部分人比你有知识，你就不能说这些问题叫做知识分子问题。陈老师认为我们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否是政见不一的问题，陈老师直言，政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被整的人大部分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很少有不是的。他指出，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出来说的，像储安平那样的人到目前没几个，所以基本上不是政见的问题。反过来，有政见问题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今天在互联网上没有知识且不满的人很多。陈老师认为，这个已经不能被理解为知识分子问题了，所以今天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可能他有很多知识，也有可能他没有什么知识。这个社会已经有条件使很多人获得某种价值，或使他们愿意为某种价值而努力，不是被界定为知识分子的人才会那样做，不是说有很多学问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事情没有太密切的关联。同时，陈老师也指出，过去比如说要整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时候，挑其中一两个人的话来说他们的这种立场，这当然有，这个是肯定的！就是现在去找“六四”时候的人，当然也能找到更多

这种话，但并不是所有到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想把这个秩序全部打乱，那个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否则的话也不会在那里维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在陈老师看来，这两个事情不完全一样。

另外，关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的关系问题，陈老师说，按梁漱溟的说法，就是没有关系！他进一步解释道，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和传统一样，因为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整个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在陈老师看来，至于今天有社会关怀的那些人是否多少有些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这是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这与很具体意义上的说法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联系没那么紧密，也许有些人是，但是没这个联系的人也有可能做。比如邓晓芒教授，他就很反传统，可是他觉得自己胸怀天下，不断地主张价值和抨击别人的价值有问题。所以陈老师认为，不能说一定需要跟传统有关联才可以做。

关于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力问题，陈老师认为，必须把它理解为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因为它并不是专门控制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去上过这个课，他们觉得我们上的少，所以他们没听过。如果他们要监控，照样能够监控到。不是说青年知识分子就被监控到，如果有的话，只是说那些年轻人的生活条件比较不好。他指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它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从实际的利益和处境来考虑年轻人，所以它不是把你当作知识分子，而是把你当作在这个社会中工作的人。陈老师觉得，从政府观点看，控制得更多的是对那些在网上乱说乱动的。所以不能把它理解为控制知识分子，而应该理解为政府对于社会的无孔不入的控制。

接着，一位同学就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问题向陈老师提问。她说，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人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冒，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人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她说，前几天有一个教授来哲学系讲学厅做讲座，该教授结合对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和对基督教的了解指出，未来基督教必将成为中国人普遍信仰的一个体系。这位同学说，最近一直在追寻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的问题，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在今天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在和基督教的博弈过程中能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体系。

陈少明老师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不是不能回答，而是他想不出怎么回答。陈老师首先谈到，很多年前，刘小枫就认为必须以基督教来解救中国，可是

今天刘小枫完全反过来！所以这对大知识分子来说不是趋势。而且在当下中国，基督教在没有知识的人群中间的传播也很多，在北方农村就很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陈老师说，中国不大可能和其他小的国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改变了文化信仰的国家。他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他认为在这方面他实在没有理由，这只是他的直观。

该同学继续就这个问题发问，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真的能够适应今天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撑吗？好像中国传统文化缺少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

陈少明老师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首先，传统文化在传统中是怎么表现的，传统的人与文化的关系是怎么样。其次，说它不能适应是指它单独消亡，还是由外力因素导致的结果。如果我们处于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就不是传统不行，而且跟这个意识形态不一样的都不行，比如在 1949 年以来的意识形态下，就不能说是传统不行，资产阶级（文化）也不行，西方（文化）也不行。所以在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结构底下，就不是传统文化自动适应或者不适应的问题，不能用这个来解释以后是怎么样。对于文化这个问题，陈老师说他不能做一个明确的判断，要看你怎么说。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同时说，即在西方什么样的信仰才是他们的生活，怎么解释是他们的信仰导致的，我们也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比如一个宗教分为很多教派，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间互不承认，甚至有些把别的说成是邪教，互不相容。这些问题是不是也都是信仰中的问题？他说不能笼统地回答这样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难度太大的问题！

接着另一个同学问到，如果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历史背景里看的话，古代或许也有，只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比如汉朝，它是靠革命或者靠朝代更替来取得权力，不是靠读书来取得权力，一开始它就瞧不起知识分子，瞧不起穷书生。等过了一段时间，它觉得知识可以运用，感觉到需要文化了，这样就慢慢地把儒家的传统思想引进来了。又比如宋朝，它不是靠革命，而是本来有权力的人把权力变了一下而已，没有革命，所以宋朝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另外，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近代之所以特别突出，主要是因为中华民国建国之后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共产党把土地所有权剥夺了。他说，根据宪法，城市里所有土地都是归国家所有，农村所有土地都是归集体所有。之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跟共产党混就可以回家，像陶渊明一样，有土地就可以生存。而现在共产党把土地没收了，

没收了以后知识分子或者跟共产党混，或者革命！所以知识分子的生存就受到威胁了，如果不受到威胁就不会遇上这样的问题。

朱一文老师说，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陈老师的整个报告是基于一个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在他看来，陈老师文章背后是相信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某些知识有需求，对有些知识是没有需求的，如果某些人具有不被需求的知识，那就会出现问題。这种看法可能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有关。朱老师认为，问題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什么样的知识被需求或不被需求，知识分子本身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比如默顿在其书中就提到，在同一个时段不同的科学家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題，也有可能科学家这样一个群体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们为了创造一些问題。比如二战后美国政府其实上马了很多军方的项目，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军方的项目批的特别多，但是到了越战时他们反思，原来很多项目是科学家或工程学家为了他们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最后做了很多烂尾的工程。总而言之，在这个知识分子问題的消解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在努力地展现其重要性？换言之，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在通过他的努力让共产党知道有些东西就是重要的！在他看来，这对于年轻教师特别重要，其实申请项目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申请项目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我们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另外他还提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即陈老师有没有比较过中国与苏联，苏联是怎么对待知识分子？苏联在八十年代末消亡是不是和它没有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问題有关系？

接着龙其鑫同学说，陈老师的文章里面其实有一个二元结构，即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他想能不能在这个大视角下面再延伸一个小视角，即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有没有反思自己。他介绍了一些“文人相轻”的现象。比如说整胡风的时候，中央和胡风的观点一开始其实分歧不大，但是和胡风敌对的那帮人把胡风整得很惨，本来一个不会扩大化的文化问題被另一个文人集团弄大。又比如八十年代初“再讲人道主义问題”的时候，王若水和周扬他们俩跳得很欢，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周扬也就这个问題整过别人。所以，龙其鑫怀疑，在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博弈中间，有没有涉及到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能否说，文人自身有这么一个分裂，然后被共产党抓住了？龙其鑫还认为，关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定位，社会需要和知识分子的才能之间有一个脱节，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固定的，是不断增长的，

就算在他满足的工作岗位久了之后还会感到不满意，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徐长福老师说，那是不是说知识分子本身也有该整的地方？

陈少明老师认为这三个问题都很大，他只能简单地说一些他的理解。一个是古代农民起义，它也有用不用文人的问题。他认为，当时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不能理解为今天的问题！它就是那个集团中的少数几个人，而不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结构，它并不影响到地方的绅士跟地方之间的结构。他指出，我们可以在很抽象的意义上说，没有知识的人拥有权力后会排斥有知识的人，可是这不能理解为现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农民起义的话，拥有权力的那些人本来都必须是有知识的，这是不需要讨论的。农民起义导致几个排斥文人的政权，刘邦这个政权有这个特点，其他的都没有太明显的表现。而在这个结构上，共产党的政权有这个特点，可是共产党把这个用政策长期固定下来，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以前的政权只是把几个人消除掉就算了，所以说不能把它们当作同一个问题。

关于知识是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被需要的问题，陈老师认为，要看情况而定，有的知识当然就不是。因为在中国那样低水平的知识底下，所有的知识在中国都不获得那样的条件，你怎么创造都创造不出来。在没有获得相应的知识应用和知识背景下，不可能创造一些知识让政府来听你的，就算有也是极少数人的。他指出，朱老师说的西方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的，可是那个已经不是太复杂的知识了，不是最尖端最普遍利用的知识，而是利用知识来谋取利益的情况。陈老师认为，这不是在默顿的意义上说的实在知识的增长应用，默顿要讲的是实在的，对此我们还必须研究一下真知识和假知识的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基本上不是面临这个问题。

关于苏联对知识分子的问题，陈少明老师说，他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以前看过的一些基本材料，他认为，苏联的知识分子如果挨整的话基本上是因为政治立场，而不是因为有知识。在苏联，不存在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的对立，然后肃清他们，所以苏联的问题不是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不满导致的。陈老师认为，跟中国比，苏联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他们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内容！但在政治斗争、整肃中，这个问题就和共产党内部的“文人相轻”的问题有关。关于那个问题，陈老师认为，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派别争取权力时候采取的策略，

说他们文人相轻也好，说他们心眼小也好，那些也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派别不一样，我站在这个派别上和站在那一个派别上有区分。后来的周扬、王若水和胡乔木他们的斗争就夹杂有后来意识形态的走向，和他们以前的恩怨都在一块。可是这个问题并不影响到另外的一些问题！至于说有没有反思，也有很多人后来写文章，说别人的也有，自己检讨的也有，可是这不解决问题，有一百个人干过坏事做检讨依然不能代替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没有代表性意义！陈老师认为，这不是我们集体做检讨，不是一个人做检讨然后我们都签名说认了。一个人说就是那个人的人格问题。这个反思依然不构成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巴金的《随想录》也会讲一些，后来还有人骂巴金，说他说得不够，这个意义所以就不那么大。

关于知识分子要不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来满足社会，陈老师认为，当我们这么说时就不是在说知识分子，而是在说在社会中谋生的人。不是说某人没有谋生的机会就要调整他的知识，这不是知识分子问题。我们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要始终以非知识分子为参照系来考虑问题。陈老师强调，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以不是知识分子的人为参照系来讨论的，而不是在我们全国人民都是知识分子这种假设下来讨论的。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就不是知识分子问题。他指出，今天要当教授就要不断地更新知识，否则年轻老师就觉得你不行，学生更觉得听得没有意思。可是这不是同样一个类型的问题。

徐长福老师问到，可不可以作如下理解，即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问题”是过去共产党意识形态范式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陈老师报告开始提到的敌对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正面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几个阶级都是很清楚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理论框架。但是在这个框架中间，知识分子群体的阶级定位很困难，它不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定位的，其他几个阶级都很好定位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在封建的生产条件下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定位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定义的。而中国当时是比较落后的，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因此就有四个阶级。而知识分子不是从占有生产资料这个角度来讲的，既不是在封建生产方式的框架中定位的，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定位的。所以它的定位很麻烦，因此成了一个问題！如果今天说“知识分子问题”真的消失了，是说整个分析的范式、阶级划分的框架都失效了。所以说没有了参照系，不跟农民、地主、工人

和资本家相参照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陈少明老师表示他大概是在这个结构里考虑的。

王硕老师说，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托马斯·索维尔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定义，认为知识分子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所以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开始于理念且终结于理念。结合陈老师给我们展示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过程，再对应这个定义，王硕老师认为，作为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生产之间会有横纵的二维的张力，但是这种张力如何解决？在她看来，这个横的张力应该是私人领域的知识与公共领域的知识之间的张力。以前私人领域的知识貌似向公共领域拓展，但是实际上我们又形成了私人圈子式的知识，所以越是私人化的知识，越是未向公共领域拓展的知识，似乎就越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纵向的领域似乎在说，一个越接近变革的行動的理念，它就越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比如 1949 年之前的理念就激发了行动，然后就产生了社会变革。相反的方向就是，越倾向保守的，跟行动无关的知识分子，就越是安全。王老师认为这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当他不成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他自身就是越安全的；同时因为越不进入公共的领域，越去行动化，他的知识自身生命力也是越弱的，越不可能去指导实践。所以，这就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一个悖论，可能在撕裂着我们，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样解决？

对于徐老师刚才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陈老师说徐老师的理解没有错，但是，事实上要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不是定位问题，而是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社会需求以及这个社会的管控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说要对他们的行为定性，这关系到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比如说给你好处，不给你好处，给你多大的权力，怎么让你在社会上活动等这一类实质性的问题，而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定位问题！陈老师认为，西方也说知识分子，他们也很难说知识分子是不是阶级，所以曼海姆说，他们是“一群漂浮的有理想者”，他们不能跟哪一个固定的阶级搭在一块。但是陈老师强调，当大家这么说的時候，一定不是在有些人不识字和有些人识字对照的情况下说这个问题的！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会不断地把它变成西方人的知识分子的模型下讨论的问题。可是在共产党说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它的知识分子的模型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对于这几个要相对复杂的问题，陈老师表示自己都觉得说

不太清楚。他说，大概有六七本西方人写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书，有时间要写一个综合的评估。

接着马永康老师提问，他说陈老师是从知识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共产党执政需要从整个社会的稳定等方面来考虑这类问题。他指出，正如陈老师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其实在解放前就有了，那时候它无需考虑社会秩序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马老师觉得，如果从知识对社会的用处来看，在解放前后就会有一个逻辑的中断，因为在解放前，更多的是基于革命者的阶级立场这方面来考虑，解放后则是一个秩序方面的考虑。在两者逻辑中断了以后，陈老师的这种解释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来党的政策的逻辑可能是一致的，陈老师的研究可能把它弄得不一致。所以，马老师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看，特别是从知识和社会秩序的方面去看，陈老师的文章会不会有一个局限，即没法解释解放前的那一块？从一个党派的特点去看的话，特别对照民国和解放前的共产党的政策的话，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

接着，一位同学问，按陈老师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知识的应用和阶级立场的矛盾，这可以简化成知识价值的兑换问题，如果不能兑换就会产生这样的历史情况。相应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由政治斗争的需要转变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知识的价值也能合理兑换，这样就导致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渐渐消解。这位同学的疑问在于，这样的价值兑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否仅仅是止步于一种物质意义上的需要的满足？比如说就业可以让很多知识分子得到比较好的社会地位和归属，然后由此他们的立场就会渐渐地消解。该同学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与其他群体不同的富有理想的群体，就像霍耐特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为了承认而斗争！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会为了实现理想而去斗争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就业或发展，所以从知识分子的价值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会继续。

陈少明老师认为，这位同学在不断改变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以致于他每次都要把它拉回来！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包含为生存而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理想的问题。所以在这前面那些不是那么有理想的有知识的人，那些人是主要的，后面才是少数特别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陈老师指出，知识肯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理想。但是这个社会理想肯定和他所期待的东西联系在一块，才会派生出理

想和现实的冲突。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所以陈老师说，后面所谈的知识分子在满足就业后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问题，不同于前面的问题，我们依然可以说前面的问题结束了，后面的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关于马老师的问题，陈老师表示，共产党本身也是被解释的，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很多是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左倾知识分子在延安加入党，特别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左倾化非常严重。按梁漱溟的解释，就是这些人所学的西方知识在这个社会得不到安置导致他们加入共产党。但是，在陈老师看来，共产党有双重结构：一个是在当时的总的结构里面，这些人就是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另一个，共产党内部要建立一个内部秩序的时候，就要稳定这样的结构，稳定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的关系。他认为这个处理的结构后来在五十年代就放大了，所以他这个解释应该不存在像马老师说的那种明显的冲突！陈老师表示，我们把共产党所谓的政治理念还原为实际上驱动他们如此行为的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个内容。陈老师进一步说明，建国后的问题和建国前的问题都叫做理想问题，早期它讲革命理想，后期也是在讲革命理想，这个没有前后的问题。只不过建国前的问题要复杂一点，就是一个双重结构，一个在更大的范围内，一个在共产党内不断放大的内部秩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时已经有了，所以后来“文革”时期不断让人重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因此他强调，这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一脉相承的一个问题。

接着龙霞老师问到，能否把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这种自然消解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胜利？陈老师在提到作为“问题”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消失时曾说，“规模越来越大，理解能力越来越高的中国‘网民’，都是这些公共知识的受惠者或应用者。”对此，能否解读为，自五四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推崇的启蒙理性、自主性思想已经逐渐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所接纳的一个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说，“消解”是知识分子的自身胜利？

陈老师认为，他不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胜利，因为知识分子没了，就无所谓知识分子胜利和不胜利。但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社会的胜利，因为在这个秩序的过程中，总的来说，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受惠，而不是说哪一个阶层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特别惨重的利益损失。这是中国社会总体上进步发展的一个表现！但它不是知识分子的，因为那些倒霉过的人已经倒霉了，未来的

人就已经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了，这就不能说是谁的胜利了。陈老师认为，社会启蒙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经常有争论。他的想法是，关于启蒙的基本观念，一方面，如果就早期知识分子所期待的那样让大家都知道这些观念，那么，可以说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连反对启蒙的人知道了。另一方面，如果说启蒙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或者社会结构，很多人觉得那是没有达到的。很多人可能会继续努力，可是他不一定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有很多人可能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在我们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明显的对立着。比如，刘小枫跟很多人对立，这就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的对立都是可以公开地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比较难严格地断定这个问题。另外，没有很多知识的人也在讲自由、民主和启蒙，那些人可能会更努力地推动。

接着邓伟生老师向陈少明老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邓老师说他没看出来陈老师文章中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和历史学的做法的差别。邓老师觉得，在陈老师的解释的过程里面，很多其实是历史学的解释，比如一个政策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来推行，你可以找到政策的某种合理性，让事情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比较合理的向度。这个让他非常受启发。比如，“赤脚医生”对他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现代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在陈老师说完以后，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理解了，因为让他看到了这些人背后做这种决策时的观念。但是他有疑问的刚好就在这里。他说，没错，你让我了解那个事情，说那个有合理性的，但是这个合理性有两个向度，就是做出决策的人的立场、欲望和信念是 **consistent**，所以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后来者，我们再看它是否合理的时候，其实这个向度是不大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明白了“赤脚医生”当时是这样的，在他们当时这样做的系统里面是恰当的一个回应。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虽然他们认为是恰当的合理的，但我现在还是觉得不合理，这个不合理就是一个 **critique**。邓老师的疑问在于，陈老师在文章中对好几个例子的表述好像只有前面的那部分，而他想看一下后面的 **critique** 的那部分。比如，陈老师现在看“赤脚医生”这个政策的话，会不会觉得合理，放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合理的？以医生为例，邓老师说在他出生那时候医疗系统很差，和他同时出生的有四个小孩，死掉两个，原因是天气太冷！他觉得如果当时医疗系统好一点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他疑问，说赤脚医生是合理的时候，我们会问当时国家的财政是多少，它投在医生这个

行业是多少。在刚才的解释里面，为什么我们觉得西方医学没有用，然后要治疗时还很昂贵。但是我们国家的医学投入很少时，当然就会觉得非常昂贵。但是如果我们的投入多一点，我们就可能负担得起了，那么医疗的服务是可以运用得上的，那么人就会死得少一些。如果有这个向度的话，就算他接受那时候的处境，他们那种处境确实是有部分事实可提供的，但这时候这种合理性里面就会有一个疑问。

徐长福老师说，邓伟生老师出生在大陆，但在香港那边成长，所以他比较没有在这个情境之中，可能多少有一点旁观者。但邓老师讲的这个理解对他比较有启发。因为这次他在英国和英国的左派有好多的交流，包括赤脚医生这些事。所以 *critique* 的这个维度是一定要有的，是要说清楚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自以为有很多理由，今天看来这些理由仍然有可同情之处，可是毕竟历史过去了，我们现在可能看得更全面、更深入，所以还是要用一些批评性的视角对当时的情境处理得更到位、更清楚一些。徐老师说他当时也跟英国的左派举了一些当时他们村子里面赤脚医生的事情，比如他们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从没有医学知识培训了几个月就成了我们村子里的赤脚医生，然后管了他们好多年。这些固然是有作用。普及教育也是一个，教他英语的高中老师只培训了三个月，从不会英语到当他的老师，最后他高考的时候考了四分！但是这些在宣传指标中间体现了教育普及率有多高。徐老师说，西方那些左派知道这些细节后也很吃惊，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邓老师提的这两个维度的区分是蛮重要的。

对于邓老师的两个问题，陈少明老师笑称他之前就想到可能有人要问，可是始终没人问。关于第一个问题，陈老师强调他的措辞是“仿卡尔·曼海姆”，第一是“仿”，第二是“卡尔·曼海姆”。陈老师认为，曼海姆所主张的所谓“知识社会学”其实是跟思想史连在一块的，曼海姆要研究的不是这个观念内部如何自洽，而是这个观念的外部动因。在陈老师看来，在他的文章里对应曼海姆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有其他原因，而且其他原因刚好也是知识社会学关心的，就是知识的创造、分配和再生产这个方面。所以是在比较粗略的意义上是“仿”曼海姆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陈老师指出，说它是思想史的也没有错，这个是不矛盾的。如果说有一些特别考虑的，就是那些关于人口和教育的数据，因为我们一般不去讲这些东西，可是在那几个关节点上这些数据都比较有参考价值。不能

说完全没有问题，百分之百正确，可是比较有参考价值，所以少用一个“仿”字。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老师承认他在论述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说决策的合理性，其实不然。他认为，那些政策的荒谬是自明的，所以他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荒谬，而不是说这样的解决问题是当时最好的！如果不是最好的，那应该怎么样，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他觉得这又关系到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做得更好，这个我们现在没法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当时大量的人饿死，差不多到了 1965 年才稍微缓过来，压根就没有什么财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连不饿死人的事情都是政府要努力的。如果说局部去解决，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要在全国提倡这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财政能力。而且他觉得，毛泽东当时那么说也不是真的说把医学所有的东西都弄没了，它只是说让那个东西先不发展，先去做别的东西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就是，这样做的后果对后来知识的增长和发展损害有多大？陈老师认为，这一定是有损害的，但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判定，这是它的决策导致的，还是这个固有的背景导致决策的范围非常有限。他觉得这个讨论起来就比较复杂，但是邓老师提的问题是对的。

徐老师说他还是想把陈老师的框架和他刚才的想法再拉近一点点。在他看来，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框架，在中国划分四大阶级，两个反动阶级，两个进步阶级，这个框架算是理论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间知识分子的问题属于理论定位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框架是非常实践的，不是纯粹理论的，像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时候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实践的，这个实践表现在紧接着还有一个框架，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所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徐老师强调，毛泽东划分这四个阶级是为了找敌人、找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是自己人，朋友是农民阶级，后来加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间，知识分子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就变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一个理论上的定位问题最后转化为实践上的一个政治定位问题，这就变成实践问题。徐老师认为，这中间也涉及到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比如他们的数量，能力能不能发挥以及社会的适应性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从共产党的理论结构和实践体制结构看，它对把知识分子放到敌人那边还是朋友这边这个问题，始终

觉得很为难！这个难处，在理论定位上本身就很难，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阶级划分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知识分子用这个标准划分不出来，所以实践中就反映出来了，到底是用他还是防他，是消灭他还是改造他，还是怎么样他，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徐老师认为，陈老师说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消失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变了，虽然党还是那个党，但是它的工作的主题，社会生活的主题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徐老师指出，不仅我们今天不讲知识分子问题了，我们也不讲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国家，也不讲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所以说不仅“知识分子问题”不讲，而且整个大的东西都不讲了！所以说它消失应该是，转型后原来整个范式都消失了！在徐老师看来，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能够把问题说得更明白更清楚一些。

陈少明老师表示同意徐老师的说法，特别是后面所说的，即知识分子问题的“消失”是整个社会转型的结果！他说，没错，现在最怕的是官商勾结，不是别的，而且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全体公民的接受基础上，不能建立在哪个阶级的基础上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另外，陈老师指出，徐老师的问题里面还套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属于中间，但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中间派都比较不留情，无间道是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革命的年代，中间派就属于摇摆，因为最害怕的事情是，关键时刻被人背叛了，所以所有人对于中间派都持有警惕态度。因此说知识分子处于中间，而中间派是特别要警惕的，跟那种已经被你打倒的、离你很远的东西比更危险。这也是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徐长福老师最后表示，今天通过陈少明老师的报告，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的思考，相信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正在消失，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可能才刚开始。此外，徐老师还欢迎大家若是有类似研究的话可以拿出来一起分享。最后，徐老师向陈少明老师、谭群玉老师以及与会师生表示感谢！

附：研习会发言记录稿

## 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

陈少明

谢谢长福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个心得。这篇文章其实是5月份写出来的。写出来之后，有几位老师都看过我这篇论文，比如长福、育川、天俊和王硕等。因为我当时想广泛征求意见，但是他们有些没有提意见，倒是帮我校对出很多的错误，在这里表示感谢。虽然主要的错误还是由另外一位同学帮我校出来的，可是他们还是帮我校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我想先简单讲一下写这篇文章的缘起。这篇文章的写作最初是因为《开放时代》。《开放时代》杂志社在日本开了一个会，日本文部省有一个课题，专门研究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知识界的状况，其中一个侧面是专门选择一些杂志。他们挑了三个杂志：《读书》、《学人》和《开放时代》。这三个杂志有其他的活动，但是惟独《开放时代》在日本东京大学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因为重庆让我写一篇与他们这个《开放时代》杂志有关的论文。我一开始看那个杂志的时候，就给他们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题目。可是他们后来告诉我，希望论文是跟《开放时代》有关的，后来我就没办法了。以后我就有一些是利用了他们发表的一些论文资料，但更多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是东京大学他们迁就了我的论文，就把这个题目定为《当下的中国跟人文学》，其实是我的论文导致他们把它改成这样的题目的，所以我就在那里做了一个主要的报告。

但是我想写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大概是在“六·四”后，“六·四”问题显然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者主要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状况使我心里有一些想法，当时我也写过一篇跟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章。我记得当时我写过一篇《英雄时代的终结》，因为当时论文没有发表，后来这篇论文找不到了，因为那时候是手写的。找不到以后，这个事情一直到放在心上。当时有几个因素跟这篇论文挂在一起，一个是梁漱溟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一个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文件中对这个问题说的越来越少，后来终于就没说了，所以我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心上。还有跟这个有关的一个事情，就是李萍他们申请了关于“改革开放社会性变动”的国家课题，当时让我一起去做其中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子课题。但我其实是挂名的，我说我没法做。但我也试图说，假如在他们的范围里允许我也来讲这个问题，可是我后来发现，大的课题里有很多框架是没法容纳的。好在他们也没有要求我做什么问题。所以几个事情合起来以后，就导致我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的时间很长，我大概应该写了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很少有文章写这么长的，因为那问题比较复杂。这个论文后来发表在《开放时代》上，大概有两万七八千的文字，所以我没法把这个论文全部给大家。我现在就用PPT把要点报告给大家，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论文发表以后，还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情况，就是这篇论文被很多大的网站转载了，比如光明网、人民网、求是网、共识网——以前我都不上这些网站，这是我去检索自己的材料时顺便看到的，估计是有兴趣的人比较多。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对于这个题目，“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我打了一个引号，这意味着，我要特别讲的是“问题”，而不是“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是问题，可是我要讲的着重点、关键词是“问题”。为什么我把它叫做“问题”？在中国政治术语中，“知识分子”不同于工人、农民，也不同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都会说有工人的问题，有农民的问题，有地主的问题，有资本家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说有“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不是一样事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者阶级的存在本身是一个“问题”。其他的呢？当时地主的存在是一个问题，资本家的存在是一个问题，可是那时候对付地主、资本家与对付知识分子不一样。地主和资本家是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他们自身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而唯独知识分子既不是要被消灭，又不能允许你按原来的状况存在，那这就是很特别的。

如果按照另一个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说：中国革命（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天然符合这种需要，他必须经过改造之后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被需要的只是他们部分的知识能力，而要改造的则是与其出身相关联（甚至因获得知识而自然产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我这个表

述不是标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表述，而是将前前后后各种各样的表达概括起来，我想即使有个别地方不太准确，也不会离得太远。或者说，我把它理解为，问题都是这样理解的。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是以往把它当“问题”，我为什么现在还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试图把它当作观察我们当代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当代意识形态当然有问题，可是“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跟我们或者说至少我这一代人的经历相关联，所以我特别要关心这个事情。我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不仅仅理解这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的问题，它牵涉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关联性。不是说知识形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是问题，其他没有关联，其实还是有关联的。所以我的论文里有一个表述，即我们要理解一个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要了解这个意识形态增加了什么内容，有时候我们还要了解它减少了一些什么内容。比如说，“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最近这十年就是被减少掉的，虽然它的痕迹没有彻底的扫除干净，可是总体上是被消除掉的。第二个，我还试图不仅仅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而且要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因为实际上，讲知识分子或讲知识分子问题的书多的不得了，那绝对不是我的发明。“多得不得了”，只是说有时候研究某些跟知识分子有关的运动，有时候研究某个知识分子，甚至是说一代一代知识分子都会提到。我只不过说，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这部分当作一个问题来讨论，而且没有在讨论那些人、那些现象中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考虑知识分子不是我的发明，我的主要问题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单独的问题突出出来。还有，我的观察带有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不是严格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而是立场，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我来讲这个“问题”。最早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表达是 1921 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中的内容，就是我们在 PPT 上看到的，当时有一个叫《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注意一下，我上面引用的有可能个别地方不准确，后来我修改过，但我这个是旧作，我来不及全部修改，以我论文的引用为准，我这里只是给各位一个大概：“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这是中共“一大”的文件内容之一。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一大”那时候的代表好像没什么工人和农民，所有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而不是其他人。可是这个文件已经包含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经给了一些那个当时形势下特别的看法。这种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革命的出路要有两个：第一，知识分子要动员大众，不能靠知识分子；第二，知识分子还必须融入大众，如果不融入大众的话，知识分子也不成。这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最早看法，这个看法一直延续到至少 70 年代，基本没有变。

当时中共中央最早的革命者，他们的理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我想要说的是，他们的理解不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们后来觉得这个意识形态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我们来看看梁漱溟，梁漱溟在这个文献出现差不多十年之后发表了评论。梁漱溟不是革命者，连革命的同路人都不是。可他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和活动家，他自己对中国问题有很多说法。他说，“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迄两度革命运动，其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简单来说就是知识分子。这是非革命者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评价，而且他还不仅这样说，而且说的更具体。他引了一个日本人的评论，即“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后面的这一段就是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没有说出来的。所以梁漱溟的这个评论虽然也指向知识分子，但指出了知识分子革命的根源，还有限制。

这样的说法，跟中共中央的说法构成了一个可以对比的问题。第一，双方共同的观察都承认，革命是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二，他们都承认知识分子和劳工存在着隔阂。不同的立场是，中共的立场是，知识分子必须跟工人结合，革命到底；而梁漱溟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安定的根源，其实知识分子本身应受到改造，不单纯说是要求他们革命到底，而是要求他们要参加社会改良。那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成为不安定的根源？他有一个评论：他们拥有知识的同时也拥有欲望，但其知识在简拙的旧农业上用不着，乡村不需要也养不起他们。而工商业不发达

的城市，也没有多少供给他们的位置，他们就都拥入军政界，生存竞争苦不堪言。这是梁漱溟对当时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描述。这种描述是说他们为什么革命，解释他们革命的根源。尽管梁漱溟也不否认有很多的理想主义，问题是，理想主义的背后还有很多没有直接理想主义的人参加革命，他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生存的一个状况。那就表明，中共一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观察跟梁漱溟的观察在根本上差别不大，只是用词不一样。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所谓“知识”究竟是什么样的功能？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简单来说，没有细化到许多具体的学科，按当时中国的状况，知识跟它的功能并不匹配。我们简单区分文科和理科，在当时的知识里面，学文科的知识是跟当时的秩序相冲突的，不管是来自东洋的还是来自西洋的。所以毛泽东说，那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讲的真理基本是西方社会知识。当然毛泽东特别喜欢讲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生产斗争的知识——大家注意一下，他特别喜欢讲“斗争的知识”，“生产”叫做“斗争”，在我们今天来说，这是不实用的词。理科的知识是怎样的情况呢？理科的知识，直接说来，我们没法把它描述成跟秩序相冲突的一个知识，但它有一个问题，理科的知识在当时是不能兑现的知识，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会简单地说一下。“不能兑换”就意味着，你拥有知识，但在社会中你不能表现你的能力，这样的话，这个知识就是没有用的。对于一个拥有知识的人来说，当这个知识不被社会认可时，他对社会的评价与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对这个社会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没有知识的人可能觉得他运气不好，然而有知识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他就会觉得社会有问题。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当时的革命队伍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当革命主力变换以后，最开始当然是没有什么工农的，后来就很多很多了，作为工农领袖的知识分子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虽然在革命的队伍中但又没有成为与工人农民同样立场或想法的人，这些人多少就是这个队伍中的异己因素，尽管每一个人不一样，自觉的程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当时大量跑到延安去的国统区知识分子，这些问题非常的明显。所以这就导致了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有很多专门的评论。

我们现在这里要得出来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即如果你的知识没法得到应用，

那么对用你的人来说，你不重要，而且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因为你不满意，别人对你也不满意。如果你没有知识，人家对你的不满意，跟你对自己的不满意都不存在。所以，一旦知识不能用，知识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负资产”，而不是相反。这个“负资产”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就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就加上了这个内容。而且资产阶级这四个字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的确他们的知识都是与西方的知识有关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改造知识分子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改造人，另一个是改造知识。我们大部分情况下讲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改造人，不太去注意改造知识的思维。这个行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要来讲为什么要改造人。按道理来说，1949年以后，参加了革命的知识分子进来以后，应该是起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可是1949年前和1949年后，就共产党而言，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据我的判断，其原因跟社会结构没有太大变化有关联。简单说来，知识没有应用的社会条件，当然涉及到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获得的知识——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获得的知识，全不是来自中国的知识，全是来自西方的知识，而西方的知识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上产生出来的。当时并不是学西方古希腊罗马知识，而都是近代知识。从严复开始，教过来的和后来留学的人学来的知识全是近代的知识。知识跟社会关系的联系性是怎样的呢？社会科学的知识当然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自然科学也一样，如果我们要去看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他就会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在同一个背景下，由几个不同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研究同样一些问题，得出一些类似的结论，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需求。还有，研究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条件是普遍的，而不是单独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社会的条件不是创造那种类型的知识，这个是有关联的问题。而从西方获得的知识来到中国没有实践的机会，非常的简单，后面我们会再说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倒过来讲。为什么知识分子会变成资产阶级？因为这些知识是来自西方的。所以梁漱溟说他们人是中国人，可是他们的历史是欧美的历史。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来自资产阶级，这句话没错。但问题是，当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跟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比如，它不是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个方面来考虑问题的。1956年以后的情况是怎样

的？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大致有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从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得来的，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描述，这个描述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定了调。一方面，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话本来是周恩来在 1956 年的时候说过的，也没有人说周恩来是错的，邓小平在 70 年代以后也这样说。另一方面，我们以后的意识形态口号是“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这六个字的说法也是从那里开始的——等到胡耀邦 80 年代出来说，必须废除这六个字，这是专门出来说的。在周恩来的报告里采取一个非常辩证的说法，一方面批评共产党内的干部，这里的干部主要指非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人，他们对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在权力中排斥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批评部分知识分子跟工人干部不合作，看不起他们，或者还看不起苏联，大概这一类的内容——这些在我的论文中有详细的说法。

但这里面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一是，周恩来注意到，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他给了一个数字，即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调查，在轻工业部里面，有 10% 的人是没有工作做的，或者说没有给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或者说让他们去做与他们专业不关联的事情。另一状况是，周恩来批评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后面这一个就类似于毛泽东在延安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从这两个批评里，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即所谓“学非所用”，当时他们拼命地说知识人才非常缺乏，可是人才缺乏的背后却又有 10% 的人是没有用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而且这 10% 人才没有用不是指整个社会，而是在最高层那里，最高层那里按道理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最少有的，可是在这里却最多。这意味着，这些人拥有的知识其实并不是他们当时能用得上的，不是他们当时急于用得上的。这也就是说，当时一方面需要知识，另一方面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知识。而一旦有知识的人被人家用不上，那你就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老说，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知识没有用的机会，那么知识一点力量都没有。不仅仅是对别人来说，别人不能利用你的力量，就是对你自己来说，也不能用知识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基本上就是这样状况。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会动不动就被改造？因为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知识的力量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你有没有力量，这不是由某些人有一些知识，某些人有一些能力，或者愿意工作的那种意向决定的，而是由一个社会条件刚性约束着。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出现“反右”。“反右”问题非常复杂，讲的也非常多了。我在这里想讲两个问题：第一，知识没有应用的条件，或运用的机会非常少；第二，跟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增长很多有关，本来就没应用的机会，然后又增长了很多人出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数据，1949年全国小学教师是83.6万，中学教师8.3万，到1957年的时候，就是八年以后，这个数字就分别变到188.4万和29.3万的地步。这里是增加的，但这里我要说一个问题，即在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描述中，为什么知识分子是动态的？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的执行要求中，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相对于没有知识的人，相对于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准而提高的。到了后来，比如到1957年前后时候，中学毕业生是知识分子。到文革的时候，高中生是知识分子，其实文革之前中学毕业生还是知识分子，但是高中毕业生比较重要了。可是到90年代以后，大学生都不太算知识分子。到今天，念完书的人不敢说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变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用的统计数字是与当时社会、与文盲相对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一个数字，当时中共领导人员中，区委以上的官员50%是文盲或者说文化程度很低——就是说小学没上完。相对来说，这些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是由这些人来定义谁是知识分子，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在这样的水准上来说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不会把读高中的人当作知识分子，因为是相对于他的知识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还有，华北地区150万党员中有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这是别人研究的数字，不是我提供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掌管权力——至少是地方权力——的人是没有知识的，然而其他领域知识分子、有知识的人不断增加，这一定是构成了很大的冲突，这就有压力了。而且你们可能还没有想到，当时小学老师的工资很高。很多人没有想到，小学、中学老师的工资比乡政干部要高得多。大概在有人民公社的时候，大部分的干部工资并不比老师高，老师的工资一落千丈是从文革才开始的。以前整知识分子是没有降低他们工资的。这又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拥有知识和拥有权力的人互相看不起对方，这个很明白。对此，一方面，我们从周恩来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看的出来。老实说周恩来是比较温文尔雅的，在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他是说的最温和的，不断有一些修正性的说法，跟那些直截了当的——比如说与毛泽东比，毛泽东说的

比较赤裸裸一点——是不一样的。倒过来，也不是知识分子当时心里一点气也没有，就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

为什么后来有“反右”？我们举储安平的说法，“党天下”是他的一个标准说法。他写了一封信，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如果这样弄下去，就变成“党天下”了，是不是你们有意要弄成清一色的。储安平这个说法当然是很明白的。但是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一定都有他这样的想法，多数人其实只是不满。有知识就会有社会理想，因为学知识的人要考虑知识在这个社会当中被应用的一个途径，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心目中能应用知识的最佳社会条件，如果不符合，他就会说这是社会的问题。前面的革命知识分子是这样，后面的右派也是这样，这是同样的，只不过他们背景不一样而已。所以从羡慕、嫉妒，到后来就发展成为恨！所以后来就有“反右”。

“反右”的实质有两条：第一，1949年之后短短几年，知识或知识分子并未整合为以革命为导引的社会秩序的有机部分，它仍然是被当作异己的因素被防范或警惕着；第二，知识分子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长，它加重了相关的社会矛盾。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右派比较多的地方并不是在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并不是在北京、上海、广州，不是在大城市甚至经济发展的地方，而是在经济不发展的地方。这个是李若建的报告，我的数据从他那里来的。如果这个说法没错的话，那么就可以辅助我前面的判断，事实上是因为，知识越没有应用的机会，你跟那个地方的人越有冲突，他们越要排挤你。而且那其实就是不满，在没有知识的地方压根没有政治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又最没有力量反抗，所以被整成右派的最多。这个比例就应该是从这里来的。他们不太会在周恩来的眼皮底下将专家动不动抓成右派，因为没有这么愚蠢的一个事情。越到下面的人就把他们反右中上面讲的理想跟下面对某一些人的那种关系的那种东西给表现出来，后来就弄得很多右派，所以小右派是比较被冤的！基本上是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没有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文革”跟“反右”有一些延续的方面。因为“文革”整的是两种人，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基本上是这两种人。最后的结果是，“走资派”不可能有太多，因为没权力的人

不是。可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跟知识相关联的，知识是不是权威，又是相对于没知识的人来说的。那么这样，所谓的整“学术权威”最后的结果就是，整比你  
有知识的人，最后不断放大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况。

另一条，我们说“改造”，不仅是改造“分子”，而且要改造“知识”，这个改造“知识”的最经典的说法就是“教育革命”。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说“教育革命”了。今天我们说教育改革，而不说“教育革命”。我们讲教育改革，是说怎么更好地创造知识，把知识变成更有用的、有创造力的。可是当时的“教育革命”有特定的说法，这个特定的说法其实不是从文革开始的。1958年前后“大跃进”的时候对知识也有很多说法，可是没有形成很完整的、把它变成像政治运动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影响的一个说法。我们引的这一段是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我们简称《决定》）。好像就是十六条，我印象是这样的，这个我没去核对。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话：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大家注意，文革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想搞教育，主要不是从全国上下各级政权中抓走资派。这个运动的名称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文化大革命”而不叫“政治革命”，不叫“权力革命”，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关于文革的起因，说法很多很多了，我们今天不作太多的说明，至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教育上做文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究竟怎么样叫作“改革教育”呢？实际上，改革教育就是要改造知识。前面提到了一个关于知识的状况，首先是文科知识。在意识形态的立场看来，文科的知识就两种，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反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革命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去看前面的所有表达，基本上是在这个眼光里面看问题的。当然具体的问题也有可能不是随时随地这么说的，比如他们也会去讨论《红楼梦》，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不管，总体上是这样的。其次是理工科的知识。事实上，按我们今天看他们当时的判断，理工科知识实际上是分为有用的知识和没用的知识，并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知识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有用的知识当然要。没用的知识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资源很不够，这是浪费资源，

这是第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培养了一些拥有无用知识的人，这些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倾向可能会多，所以对无用的知识要不断地消除，这个是教育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

1949年以后，他们对知识就开始有改造的一些企图了。这个企图最早是50年代的院系调整。关于这次院系调整，大家看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李扬研究50年代的院系调整的论文中给出来的。他说，50年代的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我们的“211”那时候就有了——调整为182所，减少了一点。所有的私立大学消失了，我估计少掉的全是私立的，估计是这样的。另外呢，工科专业有137种，教育的重心跟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但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完全取消，这个是文科中没用的知识，不仅是没用的，肯定是资产阶级的知识。没有被完全取消掉的有财经学科，毕竟这个国家还有经济生活。另外，政法学科还是存在的，因为没有取消法院，这个还是存在的，可是非常少。而且综合性大学由从55所减为13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文科生由占全部学生的33.1%变成14.9%，那就是说，文科是应该被裁减的一个对象，应该特别减少。原因当然很明显，在意识形态里属于无用的知识，保留最低程度可能要用到的，所以就少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李扬评论到，“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这个判断是不是这样，我不能断定，但是总的来说，前面的说法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这样学科的调整，与拆掉文科的观念结合的还有另一段6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这就表明了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的最好？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是因为当时的建设需要用他们，在有用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少了，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另外看法。其实学文科的也不一定都有意识形态的反骨，说不定他们都努力[接受社会主义]，但你再怎么努力，人家也觉得你不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人就给排除了。而学理科的其次，这只能理解为，学理科的比学工科的用的机会少，他们的力量就少，力量少的人当然就是没有表现机会的人，不满意的就多。这个不满意不一定是怎么样的，凭我们的生活经验，在任何地方，如果一起工作的人，有些人有工作做，有些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发挥，那么没有得到发挥的人就是不满意，这不需要他有什么样

的阶级立场，有什么样的知识。而如果这些人都类似，都是读过书的，那么就形成了他们是一个阶层或者是一个集团这样一种印象，不一定说他们虚构出来的，那倒不一定！如果是虚构出来的，不可能变成那么持久的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政策。毛泽东到文革的时候还补了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这意味着，文科的大学其实是可以不用办的，而当时大部分是没有办的，这是事实。那我们从知识的结构被应用的机会来看待他们在改造知识中的动机，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也是文革时期普遍传达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教育开刀，最经典的例证就是医学。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注意“农村也养得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这个说的非常的实际，而且说的是没有错的。因为在农村，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的医生，特别是没有设备的西医是没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没办法做手术，学那么多能干嘛？而且大部分人得的是普通的病，你没有给他医，复杂的病你又没有条件。还有，在城市里培养一个人要花很多的钱。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毛泽东给出一个结论就是，医学是不需要学那么多的，能够培养到农村里面给人家看感冒这一类病，能够看点病取点药，不要看错了药，这就是不错了！这是他基本的一个想法。对于这样一个想法，你若站在当时的背景下，你就不会觉得他的说法很荒唐。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你会觉得它很荒唐，要不他怎么会公开说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不能让那些人没事去做，或做很多没有意思的事情。

在这种教育底下的模型，一个是当时在江西办共产主义大学，那个大学是勤工俭学，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读的书也是和劳动有关的书；另一个是发明了“赤脚医生”的概念。所谓的“赤脚医生”就类似于读了三年在

农村。“赤脚医生”的意思是，他们跟农民一样，因为农民下田是不能穿鞋的，所以他们到哪里都跟农民一样光着脚不穿鞋。农村的确可以养他们，不需要给他们很高的工资。而且他们本来就从农村出来，他们也不觉得他们应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从1968年前后到1970年前后，有大量“赤脚医生”——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种——出现。“赤脚医生”就是满足基本的价值不受污染，自动改造，还有一点用。其实梁漱溟当年也差不多说过类似的话，也叫他们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体验生活，以后就不会太有欲望。所以梁漱溟在三十年代从事农村改造运动，带着一帮学生差不多也是要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当时只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后来的这些人就不只是理想主义的了，而是在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的压力下采取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上山下乡”的问题。上山下乡的背景就是“文革”，“文革”最大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大学里停课停学，还有工厂停工停产。“文革”时期，在全国七亿多人口中，具备大学和高中文化的人口超过了一千二百万。如果加上初中程度的话，拥有知识的社会成员有四千万，而且四千万主要在城市——如果初中生也在县城，那时候农村是没有中学的，更多的高中生、大学生基本上在城市才有，少数地方的县城有高中，多数是没有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刚好到了文革后期，又发现工厂都停产了，那么这些人以后去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那时就冒出了一个“上山下乡”的运动。《毛主席语录》里说，“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还有最后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后一句很重要，说明农村其实并不怎么想他们去。这两句话是同时说的。这样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指示，要改造他们，这固然有。可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不离开，他们就在城市里失业，那么多人。而且在他们失业之前，文革初期的革命是由这些人在做的。当时号召他们革命的就是要求社会平等，要反对特权，要反对很多很多东西，把整个社会权力结构搞乱了。搞乱了以后，所有的人对这个权力秩序都有不满，都觉得冲击权力秩序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毛泽东当时专门有一句话到处传播，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所有这些都都在他们心目中，如果这些人全部都在城市，那么城市就没法正常下去，所以

就用政治的力量——那时候政治动员的力量非常强大，共产党取得政权与以往历史所有的政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所以何怀宏准备写的第三本书叫做《动员社会》，大概他还没有写出来。这种动员能力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如从上到下的组织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媒在 1949 年后的不断发展，其中收音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前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上面有什么消息的，到了文革的时候，每天说毛主席最新语录，马上就要转的话，当天晚上播的话，整个社会只要有收音机的地方都知道，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是很难的。可是这个社会动员能力起来以后，你可以正动员，也可以发挥反动员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政府的动员能力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疏散了城市失业人口，这样实际上就方便控制知识分子。但是到农村去的很多人连初中毕业都没有，其实就是小学。在城市里，一家有兄弟两个人的话，不管有知识没知识，一定要去一个。在特定的政治秩序下，更多的有知识的人口与萎缩了的吸纳人口的社会能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这个矛盾就靠上山下乡来解决。这个一弄下来差不多有 10 年。

接下来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之所以说它是“最后的波澜”，因为自那次以后，知识分子采取的策略和说法跟以往就开始不一样了。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 1977 年恢复高考，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废除“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当时的状况应该是 1949 年以来最好的。在此之前，还有不断地渲染知识能够给我们带来多美妙的梦想。郭沫若参加过科学大会后还专门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即《科学的春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高考又增加了很多人去读书。

但是，很快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噩梦，就是 1989 年的问题！1989 年的问题和以往的知识分子问题比，这次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主动的。如果按政府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主动惹事。这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事情。为什么知识分子会主动出击呢？政府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西方自由化的倾向，而在此之前中间一直有间接地反自由化的运动，这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是敌对势力的挑拨，还有党内的一小撮坏人。这些解释从意识形态的背景来说，不是所有的都没有道理，只是用词的问题。如果我们抛开价值立场不说，要是没有西方的影响，大学生没有这样

的一个状况，当然大家也不会这样去做。这个解释是对，但问题是，这个解释不充分，是不够的。因为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依然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关，就是知识分子有计划地生产得太多。因为别的东西政府有计划是不一定能够做到的，可是计划教育是能够做到的！每年要招多少大学生按其指标招就做到了，而别的计划生产什么的不一定做得来，而计划教育是绝对做得来的。这导致的结果是，1982年大陆十亿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就有六百万（这时候77级已经毕业了），这六百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为什么说占城市百分比？因为这些人主要在城市，不能跟全中国的人口相比，他们导致的问题是跟他们在城市关联在一块的。可是到了1990年，全国人口是11.3亿，多了1亿多一点，可是相比之下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就有了一千六百多万，和前面的六百万比，这显然是多了很多了，而且占了城市人口的7.6%。1990年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是1982年的2.68倍，一下子多了很多，可是人口没有多那么多。

更糟糕的是经济改革很麻烦，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经济改革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从改革开放到1989年之前，大概有四个主要的事情。第一，设立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这四个地方其实真正发展的就是深圳和珠海，而且深圳、珠海原本就是农村，而厦门和汕头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发展，因为特区的性质和给予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1982年的分田，当时的术语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把农民公社收起来的田重新分给大家自己耕种。这个分田的问题很多次了，先把地主的田分给农民，然后又把农民的田收回农民公社，然后又分出去，后来又通过各种各样的征地又收回给政府，就是一直在折腾土地的问题。现在据说又有一些新的关于土地的政策了，这个我们先不说。当时分田带来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总体上没人否定分田的这个做法。第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稍微和城市有关。我们以前所有的商品价格是政府定的，政府不是根据商品能否盈利来定价格，而是根据这个社会多少人应该买到这个东西来制定它的价格。比如说大米，大米应该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米的价格定得很低，然而定得很低不是说你可以买多少，而是说分给你买多少，然后这个大米值多少钱。在这种经济生活下，低价不意味着你能够买无限的多，而是低价控制你能购买的数量，所以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票据。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生产不会增长，因为需求是假需求，不是真需求，没有需求的话就不会再生产了。而且如果

说政府规定了卖多少钱，那生产产品的成本比这高，生产的积极性从哪里来？

所以要跟资本主义学习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开始考虑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到市场上看价格多少。可是政府一开始就不敢说，明天全部商品都自由买卖，自由买卖一定有人饿死！结果政府就采取了两种价格，一部分是给到市场，一部分是政府定价，并且同样的商品也分为两个部分，当然不同的商品做了好多区分。这就导致了有权力的人凭借批条把低价的商品拿去倒卖，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个的分配严重不平等。进入流通领域的人，跟权力有关联的人都拿到批条可以去买卖，所有的人都去做生意。这样就再次造成了有知识的人没有社会力量！那时候所有大学老师的工资都非常非常的低，我记得我那时的工资是一百到两百块钱。“六·四”以后广东省最宏远的目标就是让大学老师平均一个月有八百块钱，而且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两种价格老是会有人贪污！为什么会有反对官党和太子党的事情？因为他们最有机会做这个生意！本来所有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都充满信心，觉得毕业后能够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我有多少能力就能获得多少收入，但是当时的情况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是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 1986 年要启动全民所有制改革，可是这个启动碰到“六·四”停止了，到了朱镕基才启动这个改革，才有很多国有企业工人失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要解决两种价格的问题就必须“闯关”，所谓的“闯关”就是要胆子大一点，彻底地让人家到自由市场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物质非常不够的情况下，你一放开自由买卖，所有人都要买，所以定价定得很高。在“六·四”前，我当时住在东区宿舍，一个人没事就跟年轻老师走来走去，一出门发现就连火柴都在每天的涨价，所有的东西每天都在涨价。所以当时所有人都人心浮动了！当时的情况是，1988 年全国 GDP 是 14928.3 亿元，人均人民币才 1355 元，可是物价上涨的指数比上年上涨 18.8%，可是这数据是政府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所感觉的都比政府告诉我们的严重。我倒不是说政府是骗我们，而是人的感觉往往和给出的数据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危机就一触即发，这个危机依然与知识的无法应用以及有知识的人数的迅速膨胀有关。这马上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不需要描述了，因为有想趁机捞一把的，也有普通不满的，也有理想主义的等等。单一说当时形成了什么样的状况不是太恰当，

但是我们所给出的这两个基本的东西是所有问题的背后根源与总根源。

因为学生本来充满着理想，有知识的人就会有社会要求，可是这个社会让他们觉得理想已经破灭了，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也有理由，因为当时到处在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他们对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是有要求的。还有一个是学生的天然有组织性——全部住在大学里，住在一块，要出去就一起出去。你想一下，这种情况下，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出去，如果那个人不出去肯定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北京，集中全国最多的高校。我觉得政府非常的失策，在最重要的城市集中那么多大学生。全国有学生运动的主要就那几个城市：北京、长沙——长沙历来是的一——西安、武汉，另外还有东北的，上海也有，但反应没那么激烈，反应最激烈的是长沙和西安，北京不说。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工科的学校，学生都非常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讲这个问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学生运动会起来。

后来是事后的一个检讨，邓小平说这是他对教育抓得不够，是“教育的失误”。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失误。当然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意识形态教育不够，可是我觉得教育够多了！因为我们各个人都能背四项基本原则。说教的不够，反正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人家要是没接受你，就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教的对头不对头的问题。第二种解释是政府没有明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产量没有得到控制，导致和当时经济秩序所能吸收的量产生了巨大反差——跟“文革”、“反右”时候比，这次是最严重的一次反差。其实我们说的1989动乱是1989年春夏之交，1989年秋天——也就是新的大学生进来，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大学生的数量。这就表明，事实上政府也看到这个问题。缩小最明显的是研究生，因为当时在北京被政府通缉的人很多是研究生。政府马上缩小学生的数量，从我的理解就是，政府意识到受教育的学生人数的增加与不能接纳他们本身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接下来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和以往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一样。虽然当时弄过大概几个月的学习，大概高校有一个学期是没有认真做过什么事情的，还有，年轻老师要去下面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记得当时陈立胜就被叫到河源去，因为他那时刚刚留校。但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这种事情很快就消除了。

基本上当时的意识形态核心还是要坚持现代化，所以以后讲知识分子问题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文件，最后一次讲知识分子，大概有一百多字，没有什么新意，大都是旧的对改革开放以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叙述的综

合。再往后就没有了。最近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没有专节说怎么对待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中，这个问题被消除了。我们只能这样解释。那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后面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十三亿人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有四千五百万，跟前面一千多万比多了三倍。到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知识分子人数已经到了一亿两千万，这个比例已经是迅速变大了。如果这时候用有知识、受过教育来衡量知识分子的话，很快城市里每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当然这里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个过程中纲要性的东西，而把细节忽略掉，把纲要性和比较突出的事情拿出来。

但是，是不是这个危机完全没有了呢？其实也不一定。今年年初我们再次感受到政府对此的高度警惕，就是上半年劳动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好多部联合要求各国营企业应该大量吸纳毕业生，因为今年的毕业生特别的多。但是市场提供就业的岗位和毕业生人数非常的不对称，所以上半年非常紧张。而且相应的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对青年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专门为他们的学习下了一个文件。这些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如果学生毕业的人数多，市场不能吸纳他们，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这一次没有大张旗鼓。而且我也怀疑为什么这次教育只针对青年教师而不是所有教师，这里可能还跟房价和青年教师在城市里的压力有关。而且年轻老师最容易和学生在一块，所以要特别防止他们在课堂上乱说。当然“六·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有关联。但是我不觉得他们统一布置说必须要这样。而且教育部有一个司专门管这个的，那它只好做这些事情。因为总有一些部门存在，并不是说他们觉得统一让这个部门来叫老师教什么会起什么作用，而是这个部门的存在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所以别人发那样的文件，它就发这样的文件，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情况。而不是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但是好在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在论文最后用了一个注——我在论文修改完之前，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注把它写进去。

这个就意味着说，这个事情基本上即使以后有，也是越来越小。即使是政府，它也不会把学生找不到工作叫作“知识分子问题”，学生也不会认为他们有了知识而受到一个不好的待遇，因为这个社会拥有各种各样知识的人比他们多得多了，已经不能用有知识和没知识来衡量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看过另一本书，就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在书里面有一个研究，即对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识字率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就是，识字率很高的社会和识字率很低的社会都是比较稳定的。对于识字率很高的社会，我们容易理解，因为这个社会有知识，社会的创造有活力，大家可以讲理，所有的东西都相对讲秩序。对于识字率很低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只有当权者才有知识，别人都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肯定会听有知识的，这个社会就比较容易统治。最大的问题是识字率从百分之二十几过渡到百分之四五十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国家都会有社会动荡。这本身需要很仔细的解释，那我只有这些数据，我的直观就是，在这个时期，拥有知识的人对社会提出的要求与这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越过了这个坎，它就稳定，没越过去就有问题！所以我才比较注意拥有知识的人的相对数量，注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代化产生的“知识分子问题”被现代化的发展所消解。因为中国有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中国要现代化，派留学生和办新式学校就是为了现代化，否则，以前私塾和科举就行了。而这些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换一种说法就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立场上看就叫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从这个背景产生出来的。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知识对社会提出问题就不和他拥有的知识没有有效表现有关联，这个关联今天就很弱了。今天大学教授们和以前比，当然也有不满，也会提很多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和利益的关联程度是低的——也许年轻老师是比较高的，所以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司也还在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总体上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不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改造消灭掉的，而是被历史的发展处理掉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假设。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 简讯 •

## 署名“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

2013年11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刘习根博士出版了学术专著《总体与实践》。该书是由中心策划的“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中第三本面世的专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署名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的林育川老师的文章《正义的谱系》（发表于《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13年第4期）和《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全文转载。